

# 召弘安墓志与唐九征南征

## ——兼论唐中宗时期的唐蕃关系<sup>\*</sup>

苑恩达 陆离

**内容摘要：**唐九征南征是唐中宗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一次军事行动，但相关史书中对此事件的记载则较为简略，并且存在着相互矛盾和阙载的问题。不过，大唐西市博物馆所收藏的《召弘安墓志》却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帮助。通过对《召弘安墓志》的考证，可以发现唐九征此次南征的主要对象为姚州地区（约今云南省姚安县地）的蛮族部落，与吐蕃并未有太大的关系。同时，在唐九征南征中，唐蕃双方虽然为了继续维持双方之间的关系而各自作出了让步，但吐蕃一方所作的让步要大于唐朝。这也意味着尽管中宗时期唐蕃双方恢复了和平，但在实际交往过程中吐蕃一方依然是处于劣势地位。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六月，监察御史唐九征奉命南征姚州（治所为姚城县，即今云南省姚安县）。史书记载，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设置姚州都督府（治所为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关民族、人物、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辑注”（17ZDA212）的阶段性成果。

姚州，辖境约当今云南西北部）<sup>1</sup>，但唐廷在姚州地区的统治并不牢固，姚州地区动乱时常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该地区活动的蛮族部落“时附时叛”，他们或单独发动“叛乱”，或联合吐蕃发动“叛乱”，以反对唐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吐蕃此时也在积极向唐朝西南地区扩张，而姚州地区也因此成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进行激烈争夺的地带。在这两方面原因的影响下，特别是吐蕃的直接扩张和其对姚州蛮族部落的支持，使得唐朝都督府时设时废。唐高宗中后期姚州都督府便遭到废除，唐朝被迫退出姚州地区。直到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在“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治益宁县，即今云南省昆明市）爨乾福又请置州”<sup>2</sup>的情况下才再度复置姚州都督府，重新恢复唐朝在姚州地区的势力，并逐渐取得了对吐蕃的优势，遏制了吐蕃在西南地区的扩张势头<sup>3</sup>。但在长安三年（703年），吐蕃又再次进入西南地区，并恢复了与姚州蛮族部落的联系，唐蕃双方在姚州地区再度陷入一种僵持状态。唐九征的此次南征便是在唐蕃僵持之时，唐朝针对姚州地区再度发生动乱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关于唐九征的这次军事行动，虽在史书中也有所记载，但是不同史书在记载唐九征此次南征的细节问题上却存在着相互矛盾和阙载的情况，特别是唐九征此次南征的对象以及南征的结果，仅依靠目前史书记载似乎无法得以确定。但大唐西市博物馆在2009年收藏的唐代《召弘安墓志》却为进一步探讨唐九征南征提供了帮助。该篇墓志的志主召弘安不仅是唐九征南征时的姚州刺史，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唐九征南征这一行动。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召弘安墓志》的考证来对唐九征南征这一事件做进一步的研究，对传世史料相关记载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辨析考证。同时，通过对《召弘安墓志》以及史书中关于唐九征南征相关记载的研究，来对此一时期的唐蕃关系进行探讨。

## 一、传世史料记载中的唐九征南征

关于唐九征南征一事，《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都有所记载。为方便研究，现特将相关记载摘录如下：

（神龙三年）六月丁卯朔，日有蚀之。戊子，姚萁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

1 《资治通鉴》卷201，唐纪十七，麟德元年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6340。

2 《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2941。

3 关于此时期唐朝与吐蕃在姚州地区的争夺情况，可参阅陈明迪、陆离：《〈元释墓志〉与吐蕃入滇》，《藏学学刊》第22辑，2020（1）：60-62。

征击姚州叛蛮，破之，俘虏三千计，遂于其处勒石纪功焉。<sup>4</sup>

（景龙元年）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午，雨土于陕州。戊子，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姚嵩道讨击使唐九征败之。<sup>5</sup>

会监察御史李知古建讨姚州蛮，削吐蕃向导，诏发剑南募士击之。蛮酋以情输虏，杀知古，尸以祭天，进攻蜀汉。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嵩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梁漾、濞二水（漾水即今云南省澜沧江支流漾濞江，濞水即今云南省漾濞江支流顺濞河-笔者注），通西洱蛮（为当今白族族源之一，其主要活动范围为洱海一带-笔者注），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sup>6</sup>

（景龙元年）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姚嵩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征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sup>7</sup>

根据上述史书的记载，可知唐九征南征一事当发生于景龙元年（即神龙三年，707年）六月，而《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则将其放在李知古讨姚州蛮一事中，明显是颠倒了两事之先后顺序。按《资治通鉴》记载，李知古讨姚州蛮一事发生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要晚于中宗景龙元年（707年）的唐九征南征<sup>8</sup>。同时，关于此次讨伐对象，《旧唐书》与《资治通鉴》都明确记载为“姚州叛蛮”，《新唐书》则将其记载为“吐蕃及姚州蛮”，并且还将此事归于《吐蕃传下》，似乎是认定了此次姚州蛮叛乱有吐蕃的参与。关于此次作战的具体经过，《旧唐书》与《资治通鉴》阙载，而《新唐书》则记载唐九征在此战中“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至于此次作战的最终结果及后续，三者均简单的记载为“破之”、“败之”，即唐朝获得了胜利，但是对唐九征此战后是否得到唐廷的封赏却只字不提。

虽然《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书中对于唐九征南征一事的记载较为简略，但在唐人刘肃所编撰的《大唐新语》一书中则较为完整地记载了这一事件。该书记载如下：

4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1975：144。

5 《新唐书》卷4《中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109-110。

6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1975：6081。

7 《资治通鉴》卷280，唐纪二十四，景龙元年六月条，1956：6610-6611。

8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二十六，景云元年条，1956：6661。

唐九征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其治所先后为觿唐县，即今云南云龙县漕涧镇；不韦县，即今云南保山市金鸡村；永寿县，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永安县，今地不详。其辖境约当今滇西、滇南的广大地区，南朝梁末时废除 - 笔者注）千余里讨之，累战皆捷。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即今云南洱海 - 笔者注），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管记阎丘均勒石于剑川（即今云南省剑川县 - 笔者注），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功焉。俘其魁帅以还。中宗不时加褒赏，左拾遗呼延皓论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赐绣袍、金带、宝刀，累迁汾州刺史。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云：“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是也。<sup>9</sup>

在上述记载中，可知唐九征此次的征讨对象为吐蕃，而在此次作战中唐九征不仅“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建铁碑于滇池”，还“俘其魁帅以还”。但在战后唐中宗却“不时加褒赏”，直到左拾遗呼延皓上书劝谏后，才对唐九征予以褒赏。

结合关于唐九征南征的所有史书记载来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唐九征南征的具体作战对象到底为谁。《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将其认定为“姚州叛蛮”，而《新唐书》和《大唐新语》则将其认定为“吐蕃”（虽然《新唐书》中将吐蕃与姚州蛮并举，但从其具体行文和内容安排来看，还是将吐蕃认定为主要对象，否则其不会将这一事件归于《吐蕃传下》）。不过以当时吐蕃的形势来看，似乎《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更为准确。根据《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可知，此段时期吐蕃内部正因赞普墀都松赞的突然去世而陷入混乱中。长安四年（704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sup>10</sup> 神龙元年（705年），“岱仁巴农囊扎、开桂多囊等叛，于本教之‘那拉’山顶杀岱仁巴等诸叛臣。于邦拉让，赞普兄乞黎拔布自王位被迫引退”。“鞠·莽布支拉松获罪”，“悉立叛”。<sup>11</sup> 神龙二年（706年），“洛·都鞞获罪谴”。<sup>12</sup> 景龙元年（707年）唐九征南征之时，吐蕃内部依然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在该年还发生了“清点查抄鞠氏、洛氏等获罪谴家族之财物。”<sup>13</sup> 直到景龙三年（709年），以“擒悉立国王”为标志吐蕃

9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褒锡第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164

10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49。

11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49。

12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49。

13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50。

内部才算完全稳定下来<sup>14</sup>。在这种情况下，吐蕃根本无心也无力再与唐朝继续坚持作战下去，甚至反而要担心唐朝是否会趁机对其发动进攻。这也就决定了吐蕃在这一时期不会主动进攻唐朝，以避免引起唐朝的不满与反击。另外，史书记载，景龙元年（707年）三月“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sup>15</sup>，而在同年四月唐中宗便“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sup>16</sup>。如果在此时期，吐蕃对唐朝西南地区再度发动了进攻，那么唐朝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答应吐蕃和亲请求。

虽然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唐九征作战对象为“姚州叛蛮”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新唐书》和《大唐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因为也存在着当时吐蕃边将私自挑起唐蕃冲突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开元十八年（730年）擢德祖赞的《请约和好书》中便有所体现。其中明确记载“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构斗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将万足。前数度使人入朝，皆被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sup>17</sup>关于擢德祖赞的这一说法，林冠群曾进行过分析，认为“此明显为推卸责任的饰词”<sup>18</sup>，这一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不过这一说法也反映出当时的确存在着吐蕃边将私自挑起唐蕃争斗的情况，否则擢德祖赞不会以此为借口，而唐朝一方也不会认可这一说法。这一情况的出现则与吐蕃“以贵族官僚及封建混合之君主集权制之王朝政体”<sup>19</sup>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此种政体之下，官僚贵族为“寻求更多的采邑及奴隶”<sup>20</sup>，相对于和平而言其更倾向于战争，乃至会主动破坏唐蕃之间的和平。此外，从唐九征的具体作战内容来看，似乎也证明了吐蕃可能参与其中，否则唐九征也不会“毁緄夷城”。再加上姚州蛮在与唐朝作战之时，的确会寻求吐蕃的支持。正如上述李知古在讨伐姚州群蛮之时，因其处置不当，而导致“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嵩路绝，连年不通”<sup>21</sup>。因此，虽然相较于《新唐书》《大唐新语》中的记载而言，《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可能性更高一些，但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却也无法完全否定《新唐书》和《大唐新语》中的记载。至于其他史料则或与《新唐书》《大唐新语》中的记载相似，或与《旧唐书》《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相似，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如《册府元龟》中对此事

14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50。

15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1975：5226。

16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1975：5226。

17 《全唐文》卷999，北京：中华书局，1983：10344。

18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287。

19 张云、林冠群：《西藏通史·吐蕃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91。

20 张云、林冠群：《西藏通史·吐蕃卷》，2016：91。

21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二十六，景云元年条，1956：6661。

的记载便为“唐九征为姚髡道讨击使，中宗神龙三年击姚州叛蛮，败之，俘虜三千馀计，遂树碑以纪功焉”<sup>22</sup>。《滇考》中对此事的记载则为“睿宗（中宗）景龙元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以铁絙跨漾、濞二水为桥，以通西弥蛮（西洱蛮），筑城戍之。击讨使唐九征受命自嵩入永昌，累战皆捷。尽刊其城垒，毁絙焚桥，命管记闾丘均勒石于剑川，俘其魁帅以还。”<sup>23</sup>

关于唐九征南征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唐九征回朝后受到“褒赏”一事。如上所述，关于唐九征受到褒赏一事，《旧唐书》《资治通鉴》《新唐书》中完全没有记载，《大唐新语》中虽指出唐九征最后得到了“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赐绣袍、金带、宝刀”的“褒赏”，但是这一“褒赏”却并非是唐九征回朝后就进行的，而是在左拾遗呼延皓因“中宗不时加褒赏”而上书“论之”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另外，《滇考》中也称其“爵赏久淹，论者惜之”。<sup>24</sup>按唐九征此次南征，不仅顺利平定了姚州地区的叛乱，更是直接切断了吐蕃进入姚州地区的一条路线，更好地维护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利益。但是在此情况下，唐中宗却没有立即对其进行“褒赏”，反而是在“掌供奉讽谏”<sup>25</sup>的拾遗专门上封事后才予以“褒赏”。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也值得进一步的探究。按中宗一朝，虽然政局混乱，先后出现“大权尽归三思矣”<sup>26</sup>“宗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恃权势，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门”<sup>27</sup>“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sup>28</sup>等政治混乱现象。但是，此次唐九征的“不时加褒赏”一事，应当与上述人等无关。如若真是上述诸人阻拦，《大唐新语》中不会不加以记载，并且以当时上述诸人对政治的干预程度来看，若真加以阻拦，则唐九征很有可能得不到任何赏赐。因此，中宗之所以会对唐九征“不时加褒赏”应是考虑到了其他因素，而非是受到朝中政局以及韦后等人的影响。此外，还要考虑的一点是，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导致现也无法确定中宗的“不时加褒赏”是只针对唐九征一人，还是针对当时所有参与此次南征的人员。如果是针对所有人，那么“不时加褒赏”一事就不能被算作是关于唐九征的反常现象，反而是唐朝当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sup>29</sup>情况下的一种正常现象。

22 《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820。

23 （清）冯甦：《滇考》卷上《唐初经理滇中》，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87-88。

24 （清）冯甦：《滇考》卷上《唐初经理滇中》，1967：88。

25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1975：1845。

26 《资治通鉴》卷208，唐纪二十四，神龙元年五月条，1956：6592。

27 《大唐新语》卷2《刚正第四》，1984：35。

28 《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十五，景云元年五月条，1956：6641。

29 《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十五，景龙三年三月条，1956：6633。



## 二、召弘安墓志与唐九征南征

通过上述研究可发现史料记载中的唐九征南征一事存在着两个疑问，一是唐九征此次南征的对象，二是唐九征南征之后的“褒赏”问题。然而现存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对于解决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不过，大唐西市博物馆中所收藏的《召弘安墓志》却对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最新的史料支持。该墓志高 89 厘米，宽 88.5 厘米，厚 17.5 厘米，铭文四十三行，行四十三字（图一）。志盖高 89 厘米，宽 89 厘米，厚 16 厘米，铭文四行，行四字，墓志撰写者和篆刻者不明，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专文对此墓志进行研究。据墓志记载，召弘安后期常年镇守于唐朝边疆地区，最后更是在景龙三年（709 年）去世于积石军所。在其镇守边疆的过程中，其曾被任命为“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姚州诸军事、守姚州刺史、上柱国”<sup>30</sup>一职，而在其任职姚州期间便曾参与唐九征南征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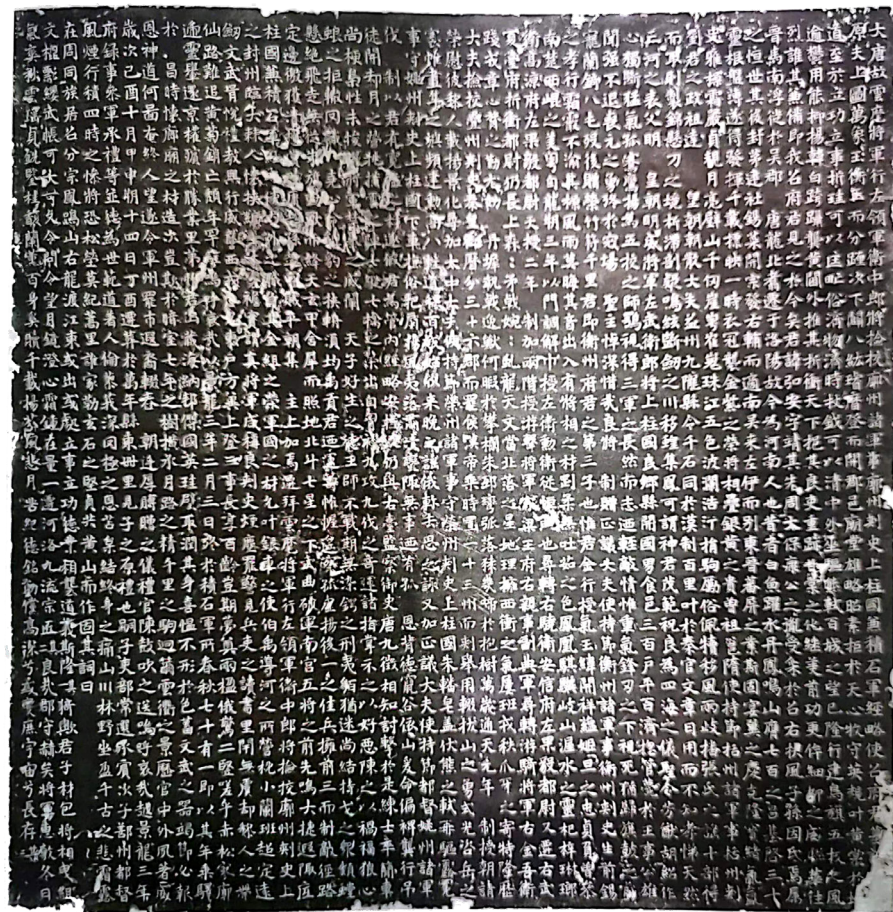
为方便论述，特将其墓志中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转录如下：

又加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姚州诸军事，守姚州刺史，上柱国。下车抚俗，把扇扬风。夷落肃清，蛮陬无事。迺有孤恩背德，窜谷依山。爰命偏裨，冀行弔伐。制以君有宽猛之材，遂假君为管内经略安抚使，仍与右台监察御史唐九征相知讨击。于是练士卒，简车徒。开却月之营，挑横云之阵。七纵七擒之策，出自胸襟；九攻九伐之奇，运诸指掌。示之以好恶，陈之以祸福。狼心尚梗，泉性未悛。曜将军禁暴之威，阐天子好生之德。王师不战，期无染镌之刑；夷貊犹迷，尚结持戈之众。类螳螂之拒辙，罔识尧心；命貔貅之挟辀，须均禹贡。君迺运筹帷幄，遥察孤虚。扬后一之佳兵，拥前三而制敌。径路悬绝，飞走无从。朱旗动兽而绛天，玄甲含犀而照地。北斗七星之下，武曲破军；南宫五将之前，先鸣大捷。遐陬底定，边徼获清。懋赏畴庸，超孙越霍。贼平朝集，主上加焉。迁拜云麾将军，行左领军卫中郎将，检校廓州刺史，上柱国，兼积石军经略使。<sup>31</sup>

通过上述墓志的记载，可知志主是与唐九征一同进行南征的，并且其墓志中还较为

30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53。

31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2012：353-354。



图一 召弘安墓志（图片采自《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2012：353）

详细地记载了此次南征的具体经过，这也就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和史料支持。

首先是唐九征此次南征的讨伐对象。《召弘安墓志》在最开始就点明了此次征讨对象，即“迺有孤恩背德，窜谷依山”，再结合上文所提及的“夷落肃清，蛮陬无事”，便可推断出此处的“孤恩背德”所指的便是姚州治下“夷落”与“蛮陬”，也就是《旧唐书》与《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姚州叛蛮”。这就意味着景龙元年（707年）的此次姚州动乱，只是由姚州当地的蛮族发动的，与吐蕃并无太大的关系。如若吐蕃真的参与进了此次姚州蛮族“叛乱”，势必会在墓志内容中有所体现，但在墓志有关此次征讨的记载中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吐蕃”或者指代吐蕃的字眼。另外，尽管从永隆元年



(680年)“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sup>32</sup>、中宗时期(705-710年)“湟中杂种诱誅西南夷,蜂合蚁聚,将陷竇蜀,朝廷骇焉”<sup>33</sup>、景云元年(710年)“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以及贞元七年(791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道出磨些蛮,其魁主潜告吐蕃。使至云南,吐蕃已知之,令诘牟寻”<sup>34</sup>等记载中可以看出吐蕃与姚州地区的蛮族部落的确关系密切,两者也的确曾联合应对唐朝在西南地区的行动。但是姚州蛮族除了与吐蕃联合行动外,也经常独自采取行动以反对唐朝在姚州地区的统治,这一点在圣历元年(698年)张柬之的《请罢姚州屯戍表》中便有所记载。在该封上书中便提及自龙朔年间(661-663年)设立姚州到圣历元年(698年)之间,姚州地区先后发生“长史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郎将赵武贵讨击,贵及蜀兵,应时破败,噍类无遗”,“将军李义总等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等一系列事件<sup>35</sup>,而在咸亨三年(672年)正月,“姚州蛮寇边,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sup>36</sup>,这些事件也就是所谓的“西南诸蛮,元是异类,或叛或附,恍惚无常”<sup>37</sup>。由此可以确定,唐九征此次南征的讨伐对象只有“姚州叛蛮”,与吐蕃并未有太大的关系,即相关史书记载当以《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为准。

其次是关于唐九征南征之后的“褒赏”问题。如上所述,唐九征在南征之后曾遇到“中宗不时加褒赏”的问题,但是与其共同作战的召弘安却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其墓志中明确记载,召弘安在完成此次军事行动后便得到了朝廷的“褒赏”,即“贼平朝集,主上加焉。迁拜云麾将军,行左领军卫中郎将,检校廓州刺史,上柱国,兼积石军经略使。”这也就意味着“不时加褒赏”一事只是针对唐九征个人的特殊情况。此外,两人在平定姚州蛮族叛乱之后的官职变动情况也值得进一步的考证。根据墓志记载,可知在此次南征之前,召弘安的官职为“正议大夫”“姚州刺史”。其中,正议大夫的官品为正四品上<sup>38</sup>,姚州刺史为正四品下<sup>39</sup>。南征之后,召弘安的官职变为“云麾将军”“左领军卫中郎将”“廓州刺史”。其中,云麾将军的官品为从三品上<sup>40</sup>,左领军卫中郎将为正四品

32 《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永隆元年七月条,1956: 6396。

3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甘元柬墓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21。

34 《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1975: 5282。

35 《全唐文》卷175,1983: 1784-1785。

36 《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1975: 70。

37 《全唐文》卷286,1983: 2904。

38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975: 1785;《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1975: 1187。

39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1975: 1918;《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1975: 1318;《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1975: 1086。

40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975: 1785;《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1975: 1197。

下<sup>41</sup>，廓州刺史为正四品下<sup>42</sup>。从此次官职变动来看，志主召弘安不仅散官官品提升了两个品级，又新获得了正四品下的左领军卫中郎将官职，可谓是收获颇丰。反观唐九征，其在平定叛乱之前的官职为“监察御史”，官品为正八品上<sup>43</sup>。在南征之后，其官职则变为“朝散大夫”“侍御史”。其中朝散大夫的官品为从五品下<sup>44</sup>，侍御史的官品为从六品下<sup>45</sup>。也就是说，在此次官职变动中，唐九征不仅新获得了从五品下的文散官，其职事官也提升了五个品级。此外，唐九征还获得了“绣袍、金带、宝刀”等赏赐。两相比较，便可发现唐廷对唐九征的“褒赏”要远超过召弘安。这便表明在此次南征的过程中，唐九征的功绩是大于召弘安的，唐廷对此也是有所了解的。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关于唐九征的“褒赏”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回顾上文《召弘安墓志》中关于此次南征的记载以及史书中关于此次南征的记载，两相对比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出入。史书中对于唐九征此次南征的记载重点放在了其切断吐蕃与姚州群蛮的联系上，也就是所谓的“毁絙夷城”。但是《召弘安墓志》中的记载重点却放在了对于姚州蛮族的讨伐上，即“示之以好恶，陈之以祸福……君迺运筹帷幄，遥察孤虚。扬后一之佳兵，拥前三而制敌。……遐陬底定，边徼获清”。此外，从唐廷对两者的“褒赏”程度来看，明显唐廷更看重唐九征的军事行动。但是《召弘安墓志》却没有记载唐九征的这一行动，这也就意味着召弘安很可能并没有参与唐九征“毁絙夷城”的行动，其主要进行的是对姚州蛮族的作战。否则以当时唐廷对唐九征这一行动的重视程度来看，志主若是真的参与了唐九征“毁絙夷城”，在其墓志中势必会有所体现，而不是仅描述其平定“姚州叛蛮”的军事行动。总之，召弘安在此次南征中，主要参与的是唐朝对姚州蛮族的作战，结果在作战后便得到了“褒赏”。唐九征在此次南征中不仅参与了对姚州蛮族的作战，更是采取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毁絙夷城”，直接切断了吐蕃与姚州蛮族的联系，结果在作战后却“不时加褒赏”，直到其他大臣上书后才得到“褒赏”，但其最后的“褒赏”程度要高于召弘安。两相对比，便可发现唐九征“褒赏”问题的出现应当与其“毁絙夷城”的军事行动有着较大的联系。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召弘安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和补充了关于此次南征的

41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1975：1899，1900-1901；《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1975：1281。

42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1975：1918；《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1975：1318；《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1975：1637；《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1975：1043。

43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975：1799；《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1975：1239。

44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975：1795；《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1975：1187。

45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975：1797；《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1975：1237。

细节内容。如从墓志中记载的“爰命偏裨，龚行弔伐”一句，可推断出此次姚州蛮族动乱，姚州刺史召弘安应当是曾先行派军进行过讨伐，但是关于此次的作战结果，墓志中却没有记载，不过此次作战很可能是以失败告终。也正因此，唐朝才会派出唐九征南下平定姚州的动乱，墓志则对此讳而不言。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此次姚州动乱应当没有吐蕃的参与，否则召弘安不会一开始只派遣“偏裨”前去讨伐。另外便是唐九征此时的官职问题，《旧唐书》的记载为“侍御史”，《新唐书》的记载为“右台御史”，《资治通鉴》的记载为“监察御史”，《大唐新语》的记载则为“御史”。结合《召弘安墓志》中的记载，可知此处当以《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准，即“监察御史”。

### 三、唐九征南征与唐蕃关系

通过对《召弘安墓志》的考证，可以确定唐九征的“褒赏”问题与其“毁絙夷城”的军事行动之间应当是存在着较大的联系，再加上墓志中明确记载召弘安在此次南征中是与“右台监察御史唐九征相知讨击”，但却对唐九征“毁絙夷城”这一行动完全阙载。这似乎不仅意味着召弘安没有参加此次行动，更意味着唐九征的“毁絙夷城”很可能是其自作主张。事实上，从志主此次出征所担任的“管内经略安抚使”一职以及墓志中所记载的“示之以好恶，陈之以祸福。……曜将军禁暴之威，阐天子好生之德”便可看出，唐朝并不想扩大此次出征的作战规模，只想快速简单的解决“姚州叛蛮”，乃至于为此先行采取招抚的措施，在招抚失败后才兴兵讨伐。在这种情况下，唐九征“毁絙夷城”的行动无疑是与唐廷的设想背道而驰，其这一行动固然切断了吐蕃与姚州群蛮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其这一行动很有可能会引起吐蕃的不满，因为唐九征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损害了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利益。如果吐蕃因此事再度和姚州蛮族联合，这绝对不是此时唐朝想要看到的情况。之后的景云元年（710年）吐蕃与姚州蛮族的联合，便直接导致了“由是姚、嵩路绝，连年不通。”

同时，唐九征“毁絙夷城”的行动也存在着破坏唐蕃神龙会盟的可能。根据“所缘和事者，孝和帝在日，其国界并是逐便断当讫，彼此亦已盟誓”<sup>46</sup>以及“琬既行，敕琬赍神龙二年吐蕃誓文，与达延定界”<sup>47</sup>的记载可知唐朝与吐蕃在神龙二年（706年）便已经通过会盟将双方的疆界进行了确定。当时吐蕃应当便已经“以铁絙梁漾、湟二水，通西

<sup>46</sup> 《全唐文》卷999，1983：10343。

<sup>47</sup> 《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1989：3922。

洱蛮，筑城戍之”，而这一情况一直到景龙元年（707年）六月唐九征南征之时还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唐朝一方默许了吐蕃这一行动，甚至很有可能是得到了双方会盟确定的。在此背景下，唐九征“毁緺夷城”的行动无疑对唐蕃神龙会盟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再加上唐九征南征的同年三月“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sup>48</sup>，四月唐朝则“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sup>49</sup>，可见唐蕃双方依然处于和平交往中，而唐九征的“毁緺夷城”则有可能会破坏唐蕃之间的和平交往。在此情况下，唐廷势必会暂时对唐九征进行冷处理，避免进一步激怒吐蕃，使其误认为唐九征的所作所为是得到了唐廷的授意。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唐廷发现吐蕃一方对此并没有太大的过激反应，再加上唐九征的“毁緺夷城”虽然是自作主张，但是的确进一步维护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利益，唐廷便以大臣上书为契机，对唐九征大加“褒赏”。

事实上，从唐九征南征之后的“褒赏”问题中也可看出中宗时期不仅吐蕃一方注重维持唐与吐蕃之间的和平，唐朝一方也比较重视。究其原因，则在于这一时期不仅吐蕃政局动荡，唐朝一方也出现了问题。在政治上，唐朝此时期先后出现武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sup>50</sup>，韦皇后“数改制度，阴储人望。稍宠树亲属，封拜之”<sup>51</sup>以及“时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延秀、侍中纪处讷、中书令宗楚客、司农卿赵履温互相猜贰，迭为朋党”<sup>52</sup>等情况，使得内部政治混乱，争权夺利现象层出不穷。在对外关系上，后突厥汗国成为唐朝的首要敌人，中宗甚至为此“下制绝其请婚，仍购募能斩获默啜者封国王，授诸卫大将军，赏物二千段。又命内外官各进破突厥之策”<sup>53</sup>，“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sup>54</sup>。在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也较为积极主动的维持唐蕃之间的和平，也正因为此唐朝才会对唐九征进行一个暂时的冷处理。

不过，尽管唐朝在此时较为积极主动的维持与吐蕃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意味着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在唐九征南征这一事件中也有所体现。固然唐九征南征之后，唐廷出于维护唐蕃关系的考虑，对其进行了暂时的冷处理。但是从后续发展来看，唐朝的这种处理方式只不过是应付吐蕃，唐九征在之后便得到了唐朝的大加“褒赏”，唐朝也并未打算让吐蕃再次“以铁索跨漾水、湟水为桥，以通西洱河”“筑

48 《资治通鉴》卷 208，唐纪二十四，景龙元年三月条，1956：6610。

49 《资治通鉴》卷 208，唐纪二十四，景龙元年四月条，1956：6610。

50 《资治通鉴》卷 208，唐纪二十四，神龙二年七月条，1956：6606。

51 《新唐书》卷 76《韦皇后传》，1975：3487。

52 《旧唐书》卷 51《韦庶人传》，1975：2174。

53 《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上》，1975：5170。

54 《旧唐书》卷 7《中宗本纪》，1975：143。



城以镇之”。甚至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更是利用唐九征此次南征所建铁柱作为唐蕃双方在西南地区划界的主要依据。这在唐玄宗的两封《敕吐蕃赞普书》中便有所体现，即“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征所记之地，诚有故事，朕岂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复旧，岂为通和？”<sup>55</sup>“缘彼州铁柱，前书具报，一言不信，朕岂厚诬？更以相仍，便非义也。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sup>56</sup>由此可见，唐朝虽然对唐九征进行了暂时的冷处理，但是却也将唐九征此次“毁緄夷城”行动所带来的好处全盘接纳。反观吐蕃一方，对于唐九征的这一行动则没有任何反应与表示。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段时期的唐蕃交往中，相对于唐朝，吐蕃处于一种劣势地位。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唐九征在南征过程中“毁緄夷城”的根本作用应当是重新确立了唐朝在姚州西北洱海地区的统治。按《吐蕃大事纪年》中关于长安三年（703年）“冬，赞普赴姜地（六诏），并攻陷之”<sup>57</sup>的记载，可知长安三年时吐蕃曾攻占六诏。同时，根据“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sup>58</sup>的记载可知六诏的活动范围主要便是在洱海地区。随着长安三年吐蕃赞普亲征六诏，也就意味着洱海地区唐朝统治的丧失和吐蕃统治的建立。同时根据“冬，赞普于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sup>59</sup>的记载可知吐蕃的确曾试图在洱海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不过这一行动很快便因为吐蕃赞普墀都松赞的去世和吐蕃政局的动荡而夭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吐蕃已经将洱海地区纳入到了自己的管辖之下，而唐朝一方则因为神龙政变一事而进入内部政治大变动时期尚未来得及关注此事。在此情况下，唐九征南征中“毁緄夷城”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上文所提到的切断吐蕃与姚州蛮族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直接推翻了吐蕃在洱海地区的统治，将该地区再次纳入到唐朝管辖范围之内，这也是其“褒赏”程度远大于召弘安的根本原因。不过，可惜的是，唐朝此次重新确立统治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景龙三年（709年）吐蕃政治秩序的稳定，吐蕃又再度和姚州蛮族建立联系，并与唐朝再次展开争夺，也因此导致了景云元年（710年）李知古再度率兵讨伐姚州蛮族一事。

综上所述，通过结合史书和墓志中的相关记载，可知景龙元年（707年）六月唐九

55 《全唐文》卷287，1983：2906。

56 《全唐文》卷286，1983：2904。

57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46。

58 《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上》，1975：6267。

59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2000：46。

征南征的主要讨伐对象当为姚州蛮族，而在此次姚州蛮族“叛乱”中，吐蕃一方因内部政局动荡的影响并未参与其中。但是唐九征在此次行动中，却自作主张“毁緮夷城”，也因此遭到了唐廷暂时的冷处理。不过，很快他就得到唐廷的大加“褒赏”，原因就在于唐九征虽自作主张，但是其军事行动的确进一步地维护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利益，特别是清除了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势力，重新确立了唐朝在洱海地区的统治。与此同时，吐蕃在唐九征南征行动中的消极被动，也意味着在此时期的唐蕃交往中，吐蕃属于劣势的一方，并且相对于唐朝而言吐蕃更希望能继续维持唐蕃之间的和平，以至于为此而暂时退出与唐朝在西南地区的争夺。另外，《新唐书》和《大唐新语》在记载此事时，之所以会将吐蕃视作主要征讨对象，应是依据唐九征“毁緮夷城”军事行动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正因其这一行动不仅切断了吐蕃与姚州蛮族的联系，更是直接推翻了吐蕃在洱海地区的统治，再加上在唐朝与吐蕃的交往中，吐蕃又经常联合西南地区的蛮族对唐朝发动进攻，于是便直接认定吐蕃为此次主要讨伐对象。

◆ 苑恩达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陆离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ABSTRACTS

###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Texts

*Saerj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various narratives and related works on the Buddha's first discourse on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this paper surveys cognate descriptions in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It especially focuses on two Tibetan texts entitled the *Dharmacakra (pravartana) sūtra* that are preserved in the Kanjur.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one work, the *\*Dharmacakrasūtra*, is not an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but an extract from the *Samṣhabhedavastu* of 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 Yet another work,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ac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works.

## A Glimpse of the Battle between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Details from the Excavated Epitaphs

*Wei Yingchun and Ma Zheny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The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four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related to Hexi 河西 in Tang Dynasty, while making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rec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ibetan literature and other records, it aims to reproduce several details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The Battle of Yumen 玉门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was recorded in the “epitaph of Li Li” 李礼墓志, which has not been attested elsewhere. The “epitaph of Yu She” 鱼涉墓志, records the tragic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Qilian City 祁连城, and that the tomb owner Yu She died on the day of victory, which can be supplement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epitaphs may be helpful to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elong 河陇 in the Tang Dynasty.

##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and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Expedition ——On the Tang-Tubo Rela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Zhongzong

*Yuan Enda and Lu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ng Jiuzheng's 唐九征 southern expedition was a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ang Zhongzong (r.705-710). The historical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se events are relatively brief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leaving gaps in our understanding. But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召弘安 housed at the Tang West Market Museum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is epitaph,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primary target of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military campaigns was the tribal groups in the Yaozhou 姚州 region,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present-day Yao'an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These expeditions had limited,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Tubo. Furthermore, during the southern expedition of Tang Jiuzheng, both the Tang and Tubo made concessions to maintain their relationship, but the Tibetan side made larger concessions than the Tang. This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ongzong, Tubo was still in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ir practical interactions.



##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of Geshu Han's Recapture of Shibaocheng

*Li Xued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Emperor Xuanzong's reig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741), Tubo launched an attack on Shibaocheng 石堡城. Recognizing its crucial strategic importance,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ianbao era (745), the Tang court successively appointed Huangfu Weiming 皇甫惟明, Wang Zhongsi 王忠嗣, and Geshu Han 哥舒翰 to lead military campaigns to manage Shibaocheng. Ultimately, Geshu Han defeated the Tibetan forces and brought Shibaocheng back under Tang control. During Tianbao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n increasingly intens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rime Minister Li Linfu 李林甫 and Crown Prince Li Heng 李亨. Although Huangfu Weiming and Wang Zhongsi were loyal to the Crown Prince and were stationed in the borderlands, they could not stay aloof from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 successive military campaigns launched to recover Shibaocheng were affected by the power struggle at the imperial court, resulting in Tang forces returning without success. Geshu Han, as an outsider of the court politics, due to his background as a minority leader, was able to avoid the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ower struggle on frontline military operations. Additionally,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general Abusi 阿布思 and Li Linfu shielded this campaign from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rivalries. Furthermore, Geshu Han had a relatively strong military force when he attacked Shibaocheng. The Tang army had already launched an offensive against Momi Cheng in Jiannan which distracted Tibetan forces and provided support for Geshu Han's campaign to retake Shibaocheng. This strategy ultimately led to the successful recovery of Shibaocheng. After the battle, Geshu Han gradually built a defensive system centered around Shibaocheng, thereby strengthening its defenses.

## A Study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Zhang Xu and Zheng Hongxia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 ser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ibet, making him an influential figure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ang-Tibetan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Zhol* Pillar, Klu khong's rise in government positions was marked by a series of promotions due to his role in reporting and suppressing rebellions. He was initially appointed as *nang blon* and later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chen po* and *yo gal 'chos pa chen po*. But Klu khong faced a challenging path to his advancement, as he did not come from a noble background and adhered to the Bon religion, which created obstacles for his career. Despite the triumph of the capture of Chang'an, Klu khong did not receive further promotions and, in fact, experienc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stagnation in

his official career. Over a decade later, he reemerged in the public eye and assumed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and *yo gal 'chos pa*, holding one of the highest-ranking positions in the Tubo court, second only to the *Blon chen*. This was the highest office he held throughout his career, as he never served as the *Blon chen*.

##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in the Treasure Text Titled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Yang Ji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ng cruc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reasure tradition, Nyang ral Nyi ma 'od zer and his famous treasure cycle *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 have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Following in the steps of earlier research that has illuminated the origins of some of the tantric texts in this cycle,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within the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 a doxographical work that also belongs to this cycl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what becomes clear is that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its Indian precedent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ox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Nyang ral's time. In the author's view, this nominally revealed treasure text obviously absorbs the doxographical framework prevalent during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nd is quite important for our further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xography of that period.

## Gri gum btsan po and the Bon Treas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 Analysis of Sga ston's (14th C.) *History of Bon Treasure*

Naljor Tsering

(Doctoral Studen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SL, CRCAO)

The treasure text or *gter ma*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mainly popular in the Buddhist Nyingma school and the Bon tradition in Tibet. Bon *gter ma*-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1<sup>th</sup> century, and a spe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regarding their burial, discovery, and transmission already took shape in the 14<sup>th</sup> century. The origin of a given *gter ma* and the reason for its transmission usually constitute the very first topics to be explained in these narratives. Regarding these topics, Nyingma scholars usually provide the story of Padmasambhava a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gter ma*-s whereas the Bon tradition connects its origin to the two transition periods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also known as the two “extinction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B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rst extinctio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n, that is, the story of the eighth king *Gri gum btsan po*, as a case study and explores how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Bon scholars use legends and stories regarding the period of the Tibetan Empire to construct *gter ma*-origin stories for their own tradition.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story,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the Bon *gter ma*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Bon doctri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inspiration it received from the Buddhist narrative (on the “extinction of dharma”), while inheriting many unique indigenous elements and cultural contexts.

## 从娘热·尼玛沃色所掘《八教善逝集》来看早期《四普巴续》及其与远传法及伏藏法统之间的关系

凯西·坎特维尔

(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娘热·尼玛沃色在十二世纪所掘出的《八教善逝集》(*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成为了宁玛派以八密教尊神为核心修行的范本。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提出《八教善逝集》中关于“事业普巴”(*'phrin las phur pa*)的部分可能形成于娘氏之前的时代,并保留了古时的修习传统。本文结合远传法(*bka' ma*)文献中属于娘氏传承的教法,进一步对这些与《四普巴》或《四普巴续》(*phur pa'i rgyu bzhi*)相关的普巴文献进行探讨。《四普巴续》教法在这些文献中的中心地位很可能影响了此后的金刚普巴传承,因为它们也强调这些教法的重要性。本文主要探讨远传法和娘氏法中的《四普巴续》教法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早期四普巴教法之间的联系。《堡岩》(*rdzong 'phrang*)中只有《八教善逝集》是很早期的,而四普巴中的一篇简短教言很有可能是源自历史上的莲花生大师。此外,《四普巴续》中引用的同一主题也被收录进了《八教善逝集》中的权威文献。娘氏将《八教善逝集》称为伏藏,使得藏王墀松德赞被重新纳入该传承体系之中。墀松德赞原本并未在此传承序列之内,而是作为《堡岩》的主要授记对象而被新加入的。因为娘热是墀松德赞的转世,《八教善逝集》伏藏中的关键文献据称是来自墀松德赞的写本。

## 以药为经：医药伏藏中的炼金术与藏地的佛教医学

麦伟哲

(美国纽约大学)

伏藏师在伏藏文献中能够以叙事的方式建构宇宙观层面的教说。如藏地的医师与仪轨师多将服石法 (*bcud len*) 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 是佛陀原初的教法, 或是藏地医学的经典。本文旨在对藏地的医药伏藏进行简要介绍, 尤其是以相传为袞邦达沃 (*Kun spangs zla 'od*, 又名 *Kusasmanpa* 或 *Sku sa zla 'od*) 所传之《因陀罗手服石》(*Dbang po lag pa'i bcud len*)、《阿育吠陀》及《医学四续》等文献中的相关教法为中心来解读, 将这些医药文献构建为佛教经典的叙事框架。总的来讲, 本文提出医药经典不一定总是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过去, 而是以叙事来规范其所期许的起源。与此类似, 在佛教医学中, 医学理论与实践指导也成为了诸佛的教诲, 疗愈与菩萨戒相融合, 医药也成为了成佛之道。将药书作为佛典来解读, 便可以将医学实践根植于一个叙事所创造的世界中。本文探究了佛教医药伏藏的叙事世界, 并讨论了其在后弘期 (约 950-1250 年) 兴起的历史背景。

##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s Speech as a Source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Sun Penghao

(Doctoral Student, Harvard University)

Inquiries into the textual sources for O rgyan gling pa's influential treasure cycle, the *Bka' thang sde lnga*, have long fascinated scholars. It is now widely accepted that it contains authentic ancient materials.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passage in the twenty-ninth chapter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as being an adaptation of a speech preserved in a fourteenth-century biography of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 (1230–1309).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lies hidden, as O rgyan gling pa transfers U rgyan pa's diction and metaphors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into the mouth of the legendary eighth-century figure Padmasambhava. Furthermore, the speech was modified from a general defense of the traditions of Rnying ma, *gter ma*, and Zhi byed traditions to a specific defense of the *gter ma*. This identification not only adds a fourteenth-century material to the current pool of the known textual sources of the *Bka' thang sde lnga*, but it also gives us an example of creative textual reuse and the microscopic manner of in which this treasure-revealer compiled his work. Furthermore, the inter-textuality offers us a rare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readership and reception of U rgyan pa's biography, as well a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polemical rhetoric in general.



## The Impact of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s (1597-1652) *Gter ma* lineage on the Religious Patter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nam rgyal Dynasty of 'Bras mo ljongs

*Xu Yuanqin*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ree great masters belonging to the Rnying ma school,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1597-1652), Mnga' bdag Sems dpa' chen po (1591-1656), and Kaḥ thog Rig 'dzin Chen po (17<sup>th</sup> C.) empowered Phun tshogs rnam rgyal (1604-?) as he was enthroned in 1642 to become the first religious king (*chos rgyal*), also Rnam rgyal, of 'Bras mo ljongs or 'Bras mo gshongs, that is, Sikkim. This opened the path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nying ma pa gter ma-revelatory tradition,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of Ü-Tsang to the southern region (*lho phyogs*), Sikkim.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w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itial transmissions of this tradition, which he had received from the great *gter ma* master 'Ja 'tshon snying po (1585-1656). Upon his enthronement as religious king, Phun tshogs rnam rgyal supported the propagation of Lha btsun's tradition throughout 'Bras mo ljongs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at would be affiliated with it.

In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Bras mo ljongs, there was a continuou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religious authority of Ü-Tsang and Lha btsun's tradition. This gradually formed a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lineages of transmission, sectarian affili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in monasteries and branches. The influence of this *gter ma* tradi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early Rnam rgyal dynasty in 'Bras mo ljongs.

## Prohibition and Recogni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 *Gter-ma* Literature of the Nying ma School in Mongolia (1607-1738)

*Giigch Borjigin*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ibetan Buddhism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Mongolia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Gelugpa School, which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undoubtedly has a strong Gelugpa presence,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are mostly written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began to dominate Mongolia,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other schools are very rare. Howev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was introduced to Mongolia, other schools also spread in Mongolia. In this article, I will survey the literature of the Nyingma School that wa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to Mongolian from 1607 to 1738, and explore three

types of non-canonical texts dealing history, ritual and commentary, and thus provide an outline of an enhanced picture of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 叙事生活世界：《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与伏藏的社会功能

娜塔莎·麦克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

本文以《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篇为例，探讨伏藏在创建一个“叙事生活世界”（这一理论是本文作者专门在此提出并使用的）中起到的社会功能。正如霍莉·盖利（Holly Gayley）、戴维·杰玛诺（David Germano）及其他人所指出，伏藏并非单独存在的现象，而是由复杂的社交互动连接过去与未来而形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网络。伏藏师通常被认为是文化英雄：他们以过去的意义来涵盖当下的时代，并通过他们与过去的联系建构出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宇宙。格萨尔史诗传统尽管在藏地解读中很少被认为是伏藏，但是其传承与伏藏传承多有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即是经启示而被发现并创制出的新文献范式，这一范式有着超越原初讲述的社会影响。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只有一份格萨尔文本自我认同为伏藏，即由丹喇嘛·却吉旺秋（'Dan bla ma Chos kyi dbang phyug）所著、格萨尔伏藏师扎册多吉（Drag rtsal rdo rje）掘出的《地狱救母》篇。通过对比阅读这一格萨尔传承与伏藏传承所重叠之处，学者们可以通过格萨尔传承来更清晰地解读伏藏的社会功用。在介绍这一重要文本之上，本文更提出通过伏藏基于一个持续有意义并有效的过去而建构出的叙事生活世界，这让个人得以与这一叙事创造出来的过去产生联系，并能在其中构建出自己当下有意义的世界。叙事生活世界因此便成为了伏藏在当代西藏取得社会关切和关联的驱动力。

##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Yushu*

*Zhu Ming*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Yushu prefecture and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ichu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e Heritage of Yushu" in Chengdu from October 18 to 19, 2021. This symposium received a total of forty papers and nearly one hundred representatives from Beijing, Qinghai, Sichuan, Hebei, Gansu and Shaanxi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re were twenty-seven scholars who delivered presentations during eight sessions, focusing on topics such a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early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rock art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Grottoes, images and texts in Buddhist art", "Transportation and rout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origin region of the Three Rivers", etc. This symposium provided a level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greatly promoted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